

黎明釗 李廣健 范家偉 編

史學傳新

社會・學術・文化的探索

中華書局



史學傳新

社會・學術・文化的探索

黎明釗 李廣健 范家偉 編

□ 責任編輯：梁偉基
□ 裝幀設計：臧娟

史學傳薪

——社會·學術·文化的探索

□

編者

黎明釗 李廣健 范家偉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6室

電話：25250102 傳真：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蘭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2100 傳真：24078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A室

□

版次

2005年12月初版

© 200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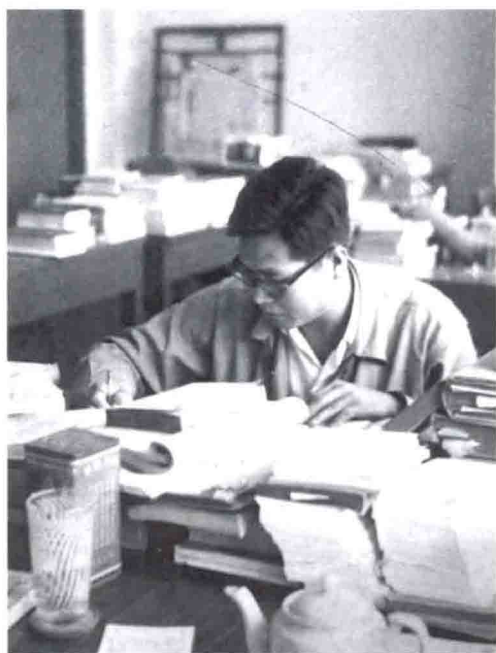
國際書號：ISBN 962-8885-55-3

獻給慶彬師

感謝老師敦勵我們對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承擔



蘇慶彬老師（攝於澳門寓所，2002年）



新亞研究所研究室，農圃道時期的蘇老師（1957年）

蘇老師、孫國棟
老師與新亞書院
創辦人錢賓四先
生、錢夫人重訪
和風臺舊居
(1975年)



蘇老師與嚴耕望先生攝於「新
亞書院第十二屆錢賓四先生學
術文化講座」(1993年3月)



蘇老師與出席「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學術研討會」部分學者合照(1995年5月)



蘇老師與陳樂素教授
(1984 年 12 月)



蘇老師與遼耀東老
師、漆俠教授、鄧廣
銘教授、張春樹教授
合照 (1984 年 12 月)



蘇老師與陶晉生教授、林
劍鳴教授合照 (1990 年)

攝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室（左起：范家偉、蘇老師、呂振基、張學明，1992年）



師生新春聚會（左起：陳榮開夫婦、蘇老師、黎明釗、李廣健夫婦、呂振基夫婦及女兒，2004年）



師生共聚（前排左起：蘇老師、遼耀東老師、孫國棟老師、遼師母、蘇師母，後排左起：黎明釗夫婦、蘇老師次子蘇崇修夫婦及兒子、陳榮開夫婦及女兒，2005年）

孫序

正當世人誤解中國文化、蔑視中國文化的時候，錢穆先生和一羣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創辦新亞書院，要抉發中國文化的真精神，使中國的「文化生命」能健康地生長，俾傳統與現代相接合。他們使命感之強烈與真誠，令我非常感動。

我既受新亞教育，又承乏新亞歷史系主任近二十年，研究所所長五年，後來更兼文學院院長及新亞中學校監十年，而未能把新亞精神往前推進一步，實辜負諸師長的教誨，心裏常感慚愧。今年返港逗留兩個月，日夕與歷史系三四十年前的畢業校友敘談，知道他們均能秉承新亞教育的精神，勤勉工作，故今日香港的教育、文化、出版、傳媒等部門的領導人，頗多為新亞歷史系的校友。將來中國文化復興，新亞歷史系校友的貢獻必不少。我在新亞服務多年亦感安慰。於是我勉勵現在歷史系諸生，務須效法學長們的精神，為新亞的理想努力。其後黎明釗君取出即將出版的論文集《史學傳薪》一書，請我作序文。此集是由黎明釗、李廣健和范家偉三人發起，並徵集多屆畢業同學自發地撰文以答謝蘇慶彬老師多年來教澤的論文集，命名為「史學傳薪」。就其敬重蘇老師的教澤言，是尊師精神；就其命名為「史學傳薪」一名言，則是重道精神。尊師重道，正是中國文化有價值的精神，同時也與我的講話不謀而合，我不能推辭為此書撰序。而且我與慶彬同學同事數十年，兩人相知甚深，我退休後，慶彬仍在新亞歷史系，並任新亞書院歷史系系主任，及其後香港中文大學改制，繼為新亞書院歷史系的聯絡人，至1993年榮休。慶彬是一位誠篤樸厚的學者，他待朋友以真誠，而治學則極篤實，教導和啟發後學無數，今其學生出版《史學傳薪》一書，乃取薪火相傳之意。但我最近不慎跌倒，一根胸骨破裂，非常痛楚，所以未能細讀各篇，只是瀏覽一過。由第一篇漢代開始，至近代的社會問題都有細心的考論，頗有份量，十分難得，待我的胸痛稍好必細心閱讀。惟其中第四篇論北魏的正統問題，引起我的感觸，因為正統論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問題，千餘年來，正反兩面爭論不休，不少大學者認為是中國文化的大劣跡，所以我強

忍胸部之痛，寫下幾行感想，附謝君篇後。其餘各篇，稍待再細讀。無論如何，諸君尊師重道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動。

匆匆以此為序。

孫國棟

2005年2月28日

編者序

研讀中國史的學者對於司馬遷的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無不景仰，無不期盼能自成一家、能通盤認識人類變遷的歷史，進而能了解天人的關係。唐代劉知幾也曾論及衡量一個「良史」的標準原則，有所謂「史學三長」：史才、史學、史識。¹清人章學誠在這個基礎上加了史德一項，總合起來就是「史學四長」。這四個崇高的標準往往是研習歷史的學者必奉的圭臬，能兼此四者的史家在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當然本書的作者們都知道「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更加知道孔子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使亂臣賊子懼的《春秋》筆法。因為在大學受業期間，這些都是我們老師經常講及的歷史精神，事隔二十多年，小子仍記憶猶新。

章學誠《文史通義》講論〈史德〉時對「史學三長」解釋得很清楚，他認為「史所貴者義也，而所見者事也，所憑者文也」。他又說：「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意謂沒有史識無法判斷是非曲直，講得清楚一點，就是沒有觀點和立場。他進一步說：「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²學就是指記誦能力，即對歷史材料所掌握的豐富程度；才是指辭采，即研究和記述歷史時要有綜合、疏理和表達能力；識就是史觀的問題。章學誠認為史識僅是退處士、進奸雄、排死節，卒成一家之言而已，最重要是有「史德」。「史德」就是史學家的心術。史學家「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全都透過文字來表達，心中性情有所偏溺，就會害義違道，這是心術不正之故。

這部集子的十一篇論文，其中一些作者曾在不同時期受業於蘇慶彬老師門下，一些又或在新亞書院聽過老師講課的師兄師弟，當中也有他的再

1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32〈劉知幾傳〉，頁4522。

2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3〈內篇三·史德〉，頁219。

傳。明釗入老師門下已二十多年，受益良多，在大學二年級便曾經修讀慶彬師的「秦漢史」，及後又修讀「魏晉南北朝史」，還在三年級時，以撰寫論文代替考畢業試，在研究院唸碩士學位時慶彬師和邊師耀東同是明釗論文的指導老師。明釗在恭聆老師講課之中，感受至深的是老師反覆要學生們讀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的〈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以及〈引論〉兩部分。因為治史不光要有科學態度，更要對本國歷史有「溫情與敬意」，而對「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和敬意」，至少不會對國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錢賓四先生在〈引論〉中批評清末民初學者治史所形成的三種流派：傳統派、革新派、科學派，其核心是要國民認識歷史，從而培養愛國情操，進而認識國家歷史文化病象，才不致妄下湯藥而疹疾日深。國民如要改進中國文化，就必須認識本國的歷史，和有愛國家民族之心。這部集子的作者都讀過《國史大綱》所講的諸種信念及其〈引論〉。慶彬師固能秉承錢先生持守的信念，他反覆強調並要求我們仔細閱讀錢先生的書，無疑也是希望我們能承接此傳統而加以發揚。

對慶彬師的教誨，我們感受至深的另一方面是老師對人文精神的一番體會，以及對史學教育的一份執着。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肯定人的價值取向、物質和精神的成就，以及人類的分析與批判方法。人類所以異於禽獸就是因為創造了獨有的人文精神，這精神反映在人文學科上，包括的範圍十分廣泛，如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等各學科知識都是。一個民族珍貴之處不單是懂得創造人文，而且更要懂得把世世代代覃思所得的心靈智慧、塑鑄為物的經驗寫在自身民族的史冊之內；而有自尊、有生命力的民族更懂得蔓衍民族的歷史經驗，一代一代的承傳下去，讓人文的花朵抽出素練的蓓蕾，使自身的民族精神放射光芒，繁衍不絕。慶彬師這種人文精神的體會，使他堅定不移的認為歷史教學是嚴肅的使命，他教導我們研讀文獻要一字一字的唸，講解歷史要如實道出真相，不因發新論就刻意扭曲事實，而削足適履，任意引用華而不實、宏大浮誇的理論，這就是他對史學教育的執着。

歷史事件是永遠不會重複的，但歷史人物的評價、人事的變遷、制度的萌芽、發軔以及潰敗卻是有跡可尋的，人們可以從中汲取教訓，論證古今。慶彬師曾憶述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錢賓四先生講課時揮灑自如，

經常以古論今，評論當代人物、時事，把歷史人物的言行舉措，與現實人事之間的心貌異同發揮得淋漓盡致，精彩異常。讀歷史的學者往往喜歡把古今中外的事件互相比較，慶彬師有時也喜歡古今對比，例如他講秦漢史，談起漢初推行郡國制，老師在導修課中出了一題討論郡國並行制的問題，其時適逢中英談判香港1997年推行一國兩制，制度的近似與時代的不同，都成了對比的焦點。一般人都認為中國歷史教學是沉悶、令人昏昏欲睡的，我們並不同意，尤其是古今史實，錯綜複雜，互有微妙的關係，確有很多可發人深省的地方。時代不斷在變，我們不能死守着傳統而與時代脫節，老師常教導我們要懂得變通，認為讀歷史，無論是仔細唸《史記》、《漢書》，抑或翻閱二十五史都沒有能力把大小事實一一記下，重要的是汲取歷史人物的行事經驗，分析典章制度的形成和崩壞，鑑古知今，應用於社會生活中。凡唸秦漢史的人都知道漢代重視通經致用，漢代的「經」就是指《五經》，其中《春秋》是為核心，漢儒又糅雜陰陽五行之說，論斷是非曲直，錢賓四先生對「通經致用」的理解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³要應用就得引經以責難，以古非今，同時也不應泥古，要知變通。

慶彬師在中文大學任教期間曾講授「中國通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中國歷史要論」，以及「中國文化史」諸科，但本集作者研究的問題並不囿於老師的講學範圍，蓋作為人文學科之一的歷史，是要弄明白人類的活動事蹟，歷史研究則是通過考察文獻證據、出土文物、考古遺蹟以及動手動腳搜集更多的新材料，進行排比和分析，然而研究的問題絕不可無中生有，任何問題或斷代都可以成為學術界關心的問題，而能喚起學者們投入精力去探究的問題必有其懾人力量。社會學家認為個人的遭遇是私人的問題，當更多的人都被相同的遭遇所困擾，這困擾本身就不是一人的命運窮厄，而是社會上有待解決的重大議題。⁴我們也相信歷史學者會對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無論是優良的，或是潰爛的，進行反覆

3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上海：國立編譯館，1940年初版，1947年第3版），頁15。

4 米爾斯（C. Wright Mills）〔著〕，張君勱、劉鈞佑（譯），國立編譯館（主譯）：《社會學的想像》（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年），頁38—40。

探討，此等問題不僅值得個人關心，往往也是社會、國家以至民族朝向健康發展的重心所在，所以這論集所探討的議題是十分廣泛的，可以說是用同一源頭的水，來醞釀出不同的醇酒。

《史學傳薪》事實上也是一部從宏觀視角，探索社會、經濟、文化及制度等方面演變的專著，排列書中論文以中國史為先，西洋史為後，並以時為序，合共十一篇。以社會問題為核心的論文主要是剖析各種制度的轉變，例如春秋戰國至漢代各地區的經濟急速發展，漢代官方對市場網絡有一套管理制度，區達仁的〈秦漢市場形制及市場管理〉一文主要探索漢代的市場網絡，特別是市的形制、市府官吏及市場管理，從而了解漢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由秦代開始至兩漢，統治階層為維持政權穩定而形成劃一的市場形制，自京城以至州郡縣均各有市，同樣設有市官管理。達仁認為秦漢的市場儘管未有全面而完善的律令配合，但具體的管理制度確保了貨幣流通及商品交換在地區市場網絡內的正常運作。

經濟蓬勃的發展與地區豪族大姓的聚散和分佈也有關係，黎明釗的〈漢代豪族大姓類別與分佈探討〉嘗試從文獻材料分析漢代豪族大姓之分佈情況，並探討其所呈現的文化和社會現象。明釗初以為漢代的豪族大姓分佈多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邊陲區域，但明釗統計所得卻以司隸地區、包括關中及河南地區，即兩漢首都的核心區域最為集中，其次為南陽郡及潁川為主。關東地區豪族大姓分佈較零散。因此以為政治權力弱，則社會組織力較強，地方家族可能取代若干政府功能的這種想法，從豪族大姓的分佈上看，其數字未能達至此結論，但明釗不能排除數字上的偏差，因為文獻多記載政治重心之事，而忽略地方史料。儘管如此，個別有較詳盡史料的地區，如《華陽國志》所記的大姓皆集中在區域性的核心地區，例如廣漢郡、蜀郡等，即在成都平原的湍水、雒水、緄水一帶，所以認為邊陲地區的社會組織，如血緣團體的力量頗強之說是可以再深入探討的。

用人制度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帝國的選舉制主要是識別孝廉和秀才，但此兩者都涉及評價個別人物的道德操守，其弊是以主觀情感來品評人物的高下，易生欺詐矯飾，漢代社會嘗譏諷「舉秀才，不知書；察孝

廉，父別居」，⁵更甚者造成權門請託，豪門大族佔據郡縣，世族門第盤踞朝廷。潘建德的〈論「左雄改制」〉主要認為加入考試制度，用人就有客觀的機制。建德認為東漢順帝時左雄的改制，是「先選後考」並加限年，用意在於防止濫選，此仍不失選舉制度的原有精神，即是先講德行，後講才學。況且「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的考試內容也很合理。雖然「左雄改制」失敗於人事不臧，但卻是選士制度的一個重要識見，尤其是考慮左雄有計劃地把考試制度滲進選舉制度之內，堵塞了選舉制度的漏洞，無疑成為隋唐科舉考試制的濫觴。

呂振基述評的府兵制與潘建德探討東漢選舉制度兩者的討論中心，都圍繞着人力資源的分配問題。振基的〈七十年來府兵制研究述評——魏周時代部分〉認為府兵制，是中古史上其中一種最重要的制度。宏觀來說，它不單是一種兵制，影響亦不只涉及制度層面。七十年來，學者不斷深化對府兵制的研究，由對府兵制的界說、淵源、性質、兵種，以至其對魏周隋唐各朝政治、經濟諸方面影響的探討，都有燦然的成績。參與研究這個課題的學者，亦不只限於中國，而日本學者亦大不乏人。振基試圖從七十年以來，自陳寅恪、谷霽光、岑仲勉、唐長孺、谷川道雄等，到毛漢光、黃永年、張偉國、氣賀澤保規諸君對魏周府兵制的研究，作一通盤的整理和述評。

關注文化和學術思想發展是本書其中一個中心。李廣健一直關心魏晉南北朝南北之間的學術文化特色和交流情況。廣健唸大學時先後修讀了慶彬師的「秦漢史」和「魏晉南北朝史」，其後承慶彬師和耀東師的統緒，完成碩士和博士論文，廣健〈論隋代的私修目錄〉一文除繼其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發現外，再從南北朝典籍累積與整理的角度，更深層地探討南北學術的問題。按隋朝曾多次編纂目錄，《隋書·許善心傳》記載許善心編了一部《七林》，這目錄在《隋書·經籍志》失收。廣健通過分析《隋書·許善心傳》的史源、作者、《隋書·經籍志》編纂時間、史臣間的關係等問題，嘗試重新探討這事。文獻記載《七林》出現時，天下剛統一，

5 葛洪(撰)，楊明照(校箋)：《抱朴子外篇校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15〈審舉〉頁393。

《七林》事實上反映了統一後學者對圖書、目錄之整合觀點，同時從南北朝官私藏書與目錄編纂情況看，南北兩地的學術發展也有差異。南朝圖書大量增加，促成南朝的目錄編纂一枝獨秀，這背景使隋朝學者在整理前朝圖書和編纂目錄時，以南朝目錄作為參考依據。許善心及其家世與南朝淵源甚深，在這些因素影響下，許善心雖於天下一統後編纂《七林》，但南朝目錄的影響力卻仍在發揮作用。

陳以愛的〈胡適、王重民論學信札中的勵耘書屋主人〉和黎漢基的〈道德理想的失落——跋《學衡》的一封信〉，是另外兩篇鑽研學術和文化問題的論文。這兩位學弟、學妹都以近現代學術史為研究的重心。

以愛畢業於新亞，後追隨耀東師在臺灣政治大學完成碩士、博士學位。胡適和陳垣之間的學術關係，向來是研究者感興趣的課題。本文主要分析由1940年代胡適和王重民的論學信札，再輔以各種新刊及未刊的文獻資料，勾勒出1937年胡適離北平南下後，直至他1946年返國前，胡、陳之間比較為人忽略的一段學術交涉。以愛考察胡適和王重民之間的往來信札後指出，陳垣的各種新舊著作，在1940年代初胡適重返學術園地、展開新的研究課題後，對他起過不少的影響。這些影響，可以分兩方面說：一是它們成為胡適構思、撰文的重要參考；二是它們一部分也成為胡適糾駁、商榷的對象。然而，不管是正面研究上的助益，或是反面的修正商榷，陳垣在那幾年間以「缺席參與」的方式，間接影響了胡適的學術研究，是可以肯定的。

漢基的〈道德理想的失落——跋《學衡》的一封信〉，是透過吳宓的一封信件反映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一些學者卻沉醉在自由戀愛的時髦風尚之中。此信件見證文化保守主義下的敗德行為，吳宓「本是一個沉迷小說世界、仰慕浪漫愛情的崇拜者」，也是新人文主義的追隨者，素來反對浪漫主義，但卻身陷塵網，拋妻棄女，走上放縱情慾的不歸路。這與他主張的道德理想是南轅北轍的。此函正是測量吳宓道德水平的最佳例子，說明二三十年代的現實生活與其時代崇尚的道德理想主義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范家偉〈唐宋時代禁咒療法解釋的轉變——從《千金翼方》到《聖濟總錄》〉一文研究禁咒療法在唐代所經歷的轉變，從巫覡傳統演變成具宗

教化的內容。唐代官方醫療機構，曾將禁咒列為學習的科目，成為醫者可用的治療方法，採用佛道兩教禁咒，企圖把巫覡的禁咒傳統排除在外。宋代以後，儒者習醫蔚然成風，對醫學也帶來一定的影響。此文以《聖濟總錄》所載的禁咒內容為基礎，探索儒家思想對禁咒解釋的影響。家偉的結論是《聖濟總錄》以儒家「誠」的觀念來解釋禁咒的效用，嘗試擺脫巫覡和佛道的解釋，可說是新的轉變。

救濟扶貧與教育，本來是政府所肩負的重任，但歷史說明民間的社會團體也在「恤貧施濟」和「助貧濟乏」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都是澳門兩大慈善團體，游子安〈清末以來的慈善與教化：澳門地區的善堂及道堂〉一文就以同善堂等例子討論澳門地區的慈善事業。眾所周知，樂善好施是中國傳統的美德，其具體表現見於慈善團體的公益服務。澳門雖然只是蕞爾之地，卻有不少善堂。同治、光緒年間，鏡湖醫院和同善堂澳門兩大華人慈善團體先後成立，是民間慈善和教化的慈善機構，工作包括贈醫施藥、救災賑濟，宣講、送善書，以至排難解紛、興學育才等工作。最可貴是此兩團體的善業延續至今，成為歷史悠久的慈善組織。子安更以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雲泉仙館慈善會善堂等例子，說明近代澳門社會的問題及善堂的時代特徵：善堂適時而生，又與時並進；從昔日華人慈善團體，發展成為服務多元化的慈善機構。由傳統「行善」的慈善事業向現代「公益」思想轉變，以前口號是「恤貧施濟」，現在是「助貧濟乏」，頗能道出箇中百年的演變。

正統論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重要議題，當中國處於分裂的時代，各政權為了互相競爭，對正統之說尤為重視；外族入主中原，因為以少數民族統治人數眾多的漢族，為了鞏固統治，消弭反抗，也特別強調自身統治的正統性。謝偉傑〈「正統」、「德運」與「漢化」——略論北魏的推定德運〉一文討論在正統化的過程中，外族統治者往往需要利用和接受漢族皇朝的正統化理論和措置，從而踏上了漢化之路。偉傑認為在宋代以前，推演五行德運是當時正統論的主流，其文以北魏政權推定德運作為個案，探討在中古時期「正統」、「五行德運」與「漢化」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其引起的政治、文化問題。偉傑首先追溯北魏以前正統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德運之說對古代政治的影響。接着以北魏兩次推定德運的事件為中